

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改变了外轮独占中国航运的局面，收回了部分利权。

——他力排守旧势力的反对，拒不理睬清政府“铁路断不宜开”的指示，支持唐廷枢建造了从唐山到胥各庄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近代铁路建造事业日益广泛展开，仅经他主持修筑的铁路就达200公里以上，占当时全国铁路总长度的一半。

——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试设天津至大沽的电报，并于第二年在天津设立电报局。光绪七年，经他奏请，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敷设成功并投入使用，这是中国正式开办的第一条陆路电线。至光绪十八年，电线电报已“布满各省”，中国近代电讯事业自此发端。

——他于光绪八年（188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

——他于光绪年间亲自创办或支持创办了一系列矿业，这些矿业采用西法开矿，并以矿区为中心，逐步建立起新型工业基地，著名的直隶开平煤矿与漠河金矿便是“各矿之翘楚”。丁文江评价他开创近代化矿业的功绩说：李鸿章创设的直隶开平矿务局是“吾国西法开矿之始”，其功“固不可没”。

——他与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联名奏请清政府派遣第一批幼童出国留学，从而首开近代留学之先河。在以后短短二十年间，他委派赴欧美的留学生达200人之多，这批留学生不仅在国外学习近代军政、机械、造船、铁路、采矿、邮电、农业、医学等专业，成了中国第一批受过正规训练的实业人才，而且眼界焕然一新，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深深感受到中国的根本性改革是“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忘也。”

——作为政府首席外交顾问和外交决策者，他积极推动清政府派遣驻外使节，开展近代外交活动。具有近代外交知识和外交才能的李凤苞、曾纪泽、张荫桓、洪钧、薛福成等人正是在他的力荐下出使世界各国，为争取国家独立、维护民族利益，进行了大量的积极的外交活动。

无论李鸿章兴办上述事业的动机是什么，他给中国社会推来的是新机器、新知识、新希望，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诚然，工业近代化、国防近代化、交通近代化、外交近代化、通讯网络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产物，没有李鸿章也会出现一个张鸿章、陈鸿章来着手于这些开拓性事业，但是，历史毕竟选择了李鸿章，这一机遇无疑包含了李鸿章本人的历史主动性，由此看来，梁启超把李鸿章称为“有名之英雄”大有道理。

李鸿章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于洋务运动的实绩上，他的若干思想观念也具有广泛影响。例如，在“同治中兴”的一片赞歌声中，他以一位政治家的敏感，意识到清朝统治已是“漏舟”、“破屋”，将要沉没、倒塌，从而发出“自强之策，当及早变

法”的呼吁。他心目中的“变法”既包括发展资本主义近代民用企业和培养新的人材，又包括对政治权力结构加以调整，给予地方洋务官僚更大的实力，其见识不仅远出乎浑浑噩噩的顽固官僚之上，而且在当时的洋务官僚中也称得上是最开明、最激进。在经济建设上，李鸿章提出“先富而后能强”的经济战略思想，积极主张优先发展有经济效益的生产企业，从中牟取高额利润，积累资金。对于新兴经济力量来说，这无疑振奋人心的信息。正因为如此，当时通商口岸的新式商人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他们或充当李鸿章的幕僚，或向李鸿章上书言事，或参与经营洋务企业。甚至连孙中山也一度千里迢迢从广东赶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幻想借助李鸿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此外，由于李鸿章对中西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差距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力主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慎于言战，以免动辄把中国置于和外国决裂乃至开战的边缘。他的这一外交思想深刻支配清末外交政策，并且畸变为一味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从而给中华民族，给近代中国打下了一连串屈辱的印记。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弱国无外交，把李鸿章参予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结为李鸿章一个人的罪孽，这无疑也是不公允的。

说来有趣的是，李鸿章与他的老师曾国藩虽然对清政府忠贞不二，并力图自强，但他们的心境是悲凉的。曾国藩终生以“末世英雄”自许，并对清朝政治前途有“补救无术，日暮道穷”的不祥预言。李鸿章把自己比作一个“裱糊匠”，把他苦心经营的洋务事业比作“勉强涂饰、虚有其表”的“纸糊老虎”——“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一揭破便一钱不值。其心态颇为感伤。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为李鸿章题了三句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仔细琢磨，这三句话足可令人玩味再三。

（郭莹）

容 闳

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西方国家直接培养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人士之一。他非常热爱祖国，学成回国后，曾以教育后进为己任，努力从事教育事业，也曾以振兴中华为职责，尽心投入洋务运动。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积极支持或援助一切进步的社会力量，至死不渝。

一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又作纯甫、纯父、纯圃、淳甫，春蒲、纯斋等）英文自署Yung Wing。道光八年（1828）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南屏乡（今属珠海市，距澳门仅五里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道光十五年（1835），七岁的容闳到澳门西塾学

习，此西塾为英国伦敦妇女会郭士立夫人所设，容闳在这里开始接受西式启蒙教育。道光二十一年(1841)，容闳转入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不久，随该校迁到香港。道光二十七年(1847)，容闳等6名中国童生得到香港商人和报馆主笔的资助，随马礼逊学校校长、美国人布喇赴美读书，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习。三年后，从该校毕业考入耶鲁大学，靠美国佐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和自己的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咸丰四年(1854)，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容闳在美国期间，系统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小学时，学习了初等算术、地理和英文；中学阶段，进英文班，学习了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目，只为进入大学学习了“正科初等之书”；进入大学后，他广泛涉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由此打下扎实的科学知识基础。当时，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容闳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又是美国北方的工业中心，容闳在目睹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教制度以后，深感中、西之间差距之大，但很想做缩短这差距之一人，自谓在美学习时“常思借此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守此宗旨，八年如一日”，期望着有朝一日“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咸丰五年(1855)，容闳拒绝了美国人多次以优厚待遇劝其留美任职的邀请，满怀抱国之志回到中国。他准备先“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哪知回国后，并未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只得四处奔波，找能维持生计的工作。回国后最初几年，先在广州粤海关做秘书工作，又到香港审判厅任译员、兼治法律。不久，换至上海海关任通事(翻译)。任通事期间，有一次他问总税务司李泰国“我在海关供职，将来是否有可能升任总税务司？”李回答说：“只要是中国人，无论谁，都没有这种可能。”此话使容闳十分反感，他愤而辞职离开了海关。此后，他到上海英商某公司充书记，又到宝顺公司当代表，经营丝茶，最后辞职自营商业。屡迁其业，终不能找到报国之机，苦闷之际，容闳对当时正蓬勃发展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产生了一线希望，想到太平天国区域去一展抱负。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攻破清军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围困，并控制了江南广大地区，容闳就在这年11月到天京晤见于咸丰六年(1856)在香港结识的干王洪仁玕。他得知洪仁玕主张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实行一些资本主义措施时，非常欣喜，并立即向洪仁玕提出自己的七点建议：一、依正当的军事制度，组成一支有纪律、战斗力强的军队；二、设立军事学校，培养有学识的军官；三、设立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国家银行制度，改革统一度量衡；六、颁布各级学校制度，将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实际上是容闳首次提出的

为中国谋求富强的大政方针，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方面的改革内容，而特别侧重于教育的更新。容闳是想通过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来实现他教育兴国的宿愿，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他向干王表示，如其建议能被采纳，他就留在天京为天国效力。干王虽然很赞同并欣赏容闳的计划，但由于其他领导人都忙于外出作战，一时无法对是否采纳此计划作出决断，只得暂时搁置起来。此间，容闳实地考察了太平天国境内的各方面情况，感到太平军“殆无有造新国之能力”，“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丧失了太平天国区域一展抱负信心的容闳，最后失望地离开了天京。回到清朝统治区域后，他继续其商业活动，“欲从贸易入手”，借雄厚财力，振兴祖国。他在九江所经办的商业曾一度颇有起色。但这些工作成效始终不能消除他为胸中的报国计划无着而生出的苦闷。此时，镇压太平天国的地方疆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鼓噪起习“西技”、以自强，“借洋兵助剿”的洋务活动，容闳于是转而靠拢掌有实权同时主张“师夷智”的洋务派，企望通过办洋务来施展自己的抱负。

同治元年(1863)，容闳经张斯桂、李善兰介绍，到安庆面见了曾国藩。容闳本想“有文正其人为予助力，予立教育计划当不患无实行之时”，但当他察知曾国藩志在筹办机器厂时，便暂置其教育计划，而大倡买机器建厂。一番交谈后，曾国藩很赏识容闳的才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以为其筹办洋务所用，遂纳容闳入幕。翌年七、八月间，曾国藩正式委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容闳到美国购得机器一百数十种返国。曾国藩、李鸿章就用这批机器在上海高昌庙建成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对容闳所办的这件事很满意，专折为其请奖，并保举他为江苏候补同知。此后，容闳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协助洋务派办理洋务，其间，曾充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幕僚，先后为丁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等书；曾于同治五年(1866)建议并得到曾国藩批准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立了兵工学校，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才，使其教育计划得以“反试其锋”；还曾于同治六年(1867)在上海发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企望“俱用中国人合股”，以打破外国洋行的垄断局面，但因集资困难又得不到清政府支持而未成。同治七年(1868)，容闳在丁日昌的支持下向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条陈四项建议：一、组织纯粹股，全用华人的合资汽船公司；二、选派120名青年学子分四期按年递派出洋留学，期限定为15年，为国储备人才；三、开矿产，筑铁路以尽地利，畅交通；四、禁止外国教会干涉中国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容闳自谓“此条陈之一、三、四，特假以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因虑单提教育计划有偏颇之嫌而易遭批驳，特列出四条而置教育于第二。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发生，容闳被清方谈判代表丁日昌电召前任译员。是年，通过曾国藩等

人联名奏请，清政府终于批准了容闳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的建议，并任命他为留学生监督、“出洋肄业局”副委员。容闳在国内盘旋了十几年，总算争取到了实现自己以教育救国心愿的机会，他欣然地接受了任命。同治十一年（1872）赴美就任该职。光绪元年（1875）以后，改任清政府驻美副公使。

在海外就职期间，容闳竭力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力阻贩卖华工。那是同治十二年（1873）春，容闳正兴冲冲由美国返回天津，向直署奏请购买西方先进装备事宜。直督告诉他，秘鲁正派来特使，要求与中国签订关于招募华工赴秘鲁的条约，命他就此事与秘鲁特使谈判。提到华工，容闳不禁想到他咸丰五年（1855）由美归国途经澳门时所见的情景，许多被贩卖到古巴、秘鲁等地的华工，以辫相连，被牛马般牵往船舱，他还在当时听说，华工运达目的地后，将被当做货物带到市场上叫卖。不少华工得知受骗，在船上反抗遭害，还有的因不愿为奴跳海自杀……。谈判时，秘鲁特使竭力声言华工将受到优厚的待遇，容闳则严正地陈述了他的所见所闻，驳斥对方：“什么优厚待遇，不过是给你们增添牛马而已”，并坚拒在野蛮的买卖华工的条约上签字。为了说服清政府，容闳又亲至秘鲁华工住处，调查了解华工远离祖国后惨遭折磨的实情。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容闳获取了大量华工受虐待的事例，他还秘密拍下华工身上被笞、被烙伤痕的照片，以有力的证据回击了秘鲁特使的抵赖，使蔓延多时，且愈趋愈烈的贩卖华工出洋风潮开始得到制止。同治十三年（1874），美国支持日本侵犯台湾时，容闳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美国前领事等人的阴谋策划，协助江海关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意见，并受总署命赍函赴华盛顿“面为理论”。光绪元年（1875），美国同孚洋行代秘鲁拐运华工，同时加重虐待华工、大肆排华。容闳偕同陈兰彬以驻美公使的身份再三照会美国国务卿，提出抗议，要求美国政府按中美续增条约的规定，对中国侨民加以保护。容闳还发动上海粤籍实业家集资万两，筹办中文报纸《江报》，“于有裨于中国者，无不直陈”，与英人在上海主办的《字林西报》、《申报》针锋相对，进行笔战。凡此种种，都充分表现了容闳满腔的爱国热情和严正的民族立场。

容闳倾心竭力地为清政府处理“洋务事业”中的大小事宜，满心期望中华民族兴旺发达，清政府腐败、懦弱和保守的一贯政策却仍使他事业难成。光绪六年（1881），清政府以留学生在外“放浪淫佚”、“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会社，……皆有不正当之行为”为由，分批全部撤回了在美的留学生，关闭了留学生事务，使留学事业中途夭折，亦使容闳“毕生志愿横遭摧残”。容闳因而痛感“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次年，他愤然退出洋务运动，从此，郁郁寡欢地寓居于美国，期盼着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以共谋进取。

在中国的近代维新思潮中，最早提出教育救国思想的是容闳。早在美国学成归国时，容闳就抱定“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志向，自信“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甚至认为，用此教育途径，是“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无论是在同情农民革命，还是参加洋务活动时，以至后来参与维新变法，倾向革命共和期间，他都始终怀着实现教育计划的希冀，他的热情爱国和追求进步因而也尤为集中地表现在其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上。

容闳一生的主要教育活动先后有五次。第一次是同治元年（1862）向太平天国条陈七事时，提出制定学校教育制度，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的建议；第二次是同治五年（1866）建议在江南制造厂附设兵工学校，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材，得以实行；第三次是同治九年——光绪元年（1870—1875）间向清政府条陈留学计划，筹划、组织并亲率中国青少年赴美留学；第四次是同治十二年（1873）在故乡南屏建立“容氏甄贤学校”；第五次是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6—1898）提出组织铁路公司和建造津镇铁路计划时，建议择地设立铁路学校。

在容闳的教育活动中，被定为“最大事业”者是留学教育，容闳以为这是他自己“报国之唯一政策”。为了这最大事业，容闳真可谓殚精竭虑。先是在同治七年（1868）通过丁日昌向清政府提出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的建议，还规划了派遣方法、留学期限、教学计划以及留学管理和经费；初次先定120名学额以试行，此120名又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以12—14岁为度；学生派出时以汉文教习同往，以使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然而此计划因收受条陈者、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反对而被搁置了起来。

同治九年（1870），容闳借参与处理天津教案谈判的机会，力促丁日昌向曾国藩等人重提留学教育计划，得曾国藩等人的赞赏和联衔入奏，是年冬，该计划终获清廷批准。容闳闻知后，欣喜地前去南京，与曾国藩共商留学事宜，当下决定设立留学预备学校和留学事务所。容闳随即到上海设立留美学生预备学堂，规定凡留学学生须入预备学堂学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同治十年正月（1872年2月），曾国藩等奏定《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六条，同时任命陈兰彬、容闳分别任留学生正副监督，刘翰清为预备学校校长。容闳当年便先期抵美，布置学生住宿等事。8月11日，中国第一批幼童启程渡太平洋赴美。此后，清政府又逐年分批三次派学生到美国，共派出120人。容闳积思多年的心愿和计划，终于借“达官”之力获得了实现之机。

留学计划是得以实行了，但容闳所持的教育思想

与清政府甚或是曾国藩等洋务派所遵循的教育宗旨有很大距离。容闳教育思想的主旨是爱国维新，方法是学习西方。从这两点出发，他在引进西方教育时，着重讲求教育培养政治领袖和经世之才的作用。他在介绍西方大学文凭与学位制度的社会效益时重点指出：教育是要“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才，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并说“大学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他在这里所说的“势力”，实指人们在受教育中获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后所产生的佐世之力。容闳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培养这样有“势力”之人，即培养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和重要的经世之才，这与功名仕途的封建教育观显然相悖。

容闳在教育实践中，非常强调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他批评封建教育使人“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惯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相信留学教育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带来思想解放。因为留学生“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常性灵上所受极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任留学生副监督期间，他欣然地赞赏留学生摆脱封建教育所施行的思想控制以后的种种变化，鼓励他们向个性自由发展的追求。他还针对国内的种种非议辩护道：他们“一切言论常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致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

容闳还特别重视以实学为主、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他多次提出要“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提倡兵工学校着重“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修建铁路与开办铁路学堂结合起来；“凡测量、绘画、使车、制料等事均宜选聪颖子弟习学，以为造就人才地步”。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教育可“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容闳对早期留美学生所学科目的订定，也侧重于军政、船政、制造等专业，环绕着培养近代中国科技实习人才这一中心。此外，容闳还提出过建立面向民众的各级学校，即实行普及教育的主张。他说“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是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力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他是想通过近代化的普及教育来唤起整个民族的民主意识。到晚年，容闳分外重视女权，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谈到：吾国女学甫在萌芽，宜筹巨款大力兴办，“选俊秀女子令入学校受教育，养成种种有用之人”。他还说这事“有关国家根本大计”，不能“迂远忽之”。

容闳对教育的主张、建议及其对教育的希冀，都贯穿着爱国维新的思想，代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基本要求，而这一切与只希望学点西方的科技来维护现存的封建制度的洋务派的宗旨不完全同轨甚至严重错位。洋务派抱定“中体西用”，容闳则坚持主张全面学西方，因此，在容闳实施其教育计划期

间，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的磨擦始终未停，且愈演愈烈。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决定留学生副监督的人选时，洋务派就宁愿任用一个对西方一窍不通的封建守旧官僚陈兰彬为正职，而不选熟悉美国情况的容闳，丁日昌曾向容闳解释：“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护反动力，或竟事败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容闳作为副监督在美管理留学事宜时，先后几任肄业局正委员和洋务派首领又不断与他发生冲突。先是陈兰彬与容闳“时有齟齬”，赴美一年即要求总署内调；继任者区澐良到任不久就要求“中道撤回留学生”；再接任者容增祥则直接诋毁容闳说：在美学生“抛荒中学，系属实情。由于容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学中学”所致；最后是由陈兰彬推荐的吴子登，一到任便“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并出告清廷：“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说，如不中止留学活动，这些留学生“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据此指责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识大体”、“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令容闳“勿固执己见”，“不必多管”，以后留学之事应由吴子登“设法整顿，以一事权”。光绪三年（1878）以后，容闳被指定专任驻美副使之职，被排斥于留学事务所之外了。光绪六年（1881），清政府接受吴子登的建议，撤消出洋肄业局，令所有留学生先后分三批回国。容闳筹划和实施多年的留学生教育计划终于夭折了。首批中国留美学生，已受过若干年新教育，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回国后在政治、外文、工商、科技和教育界成为卓有贡献的知名人士，有些人成为近代中国铁路、电报、采矿、造船等行业的重要人才。

三

光绪八年至光绪二十年（1882—1894）容闳侨居美国期间，仍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闻知中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他接连给曾任驻美公使参赞和翻译蔡锡勇发出两函，提出应战的两条建议：一、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购置铁甲舰3、4艘，雇佣外国军队5,000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路；二、将台湾抵押给西欧任何强国，借款4亿美金，作陆海军继续作战之军费。蔡锡勇传信息于张之洞，张对其第一项建议很赞成，即刻回电，让容闳去伦敦借款，款数借到后，因总税务司赫德和李鸿章坚决反对以关税为抵押，此事只得作罢。第二年初夏，容闳回国供职于张之洞幕中，后又为刘坤一做江南交涉委员。光绪二十二年（1896），容闳向清政府提出参仿美国银行章程，设立国家银行和准美商筹资4亿两，“邦同中国始终造成全境铁路”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前者因遭盛宣怀反对而废弃，后者虽缩小到修津—镇铁路一条，最终还是因张之洞等人反对以及德国从中作梗而中辍。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夏，容闳对康有为、

翁同龢

梁启超等人鼓动的维新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频繁地与康、梁等人来往，成为赞助变法的积极分子。戊戌政变发生前后，容闳努力在美国驻华使馆和英国传教士中间活动，营救变法志士。事后，避居上海租界。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等人在上海筹组以“自立会”为核心的“中国国会”，容闳被推为正会长。他在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中表示：“决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中国）之权”，并宣言：中国国会“端在复起光绪帝”。此宣言反映了容闳当时既主张起义反清，又拥戴光绪复辟，尚未认清中国出路的矛盾的思想状况。“自立军”起义计划遭破坏后，被通缉的容闳化装易名逃离上海，在去日本的轮船上，容闳与孙中山不期而遇。受孙中山的邀请，容闳在日本停留数日，乘机与在日的中国革命派以及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会谈沟通。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迫于清政府的一再通缉，容闳再次赴美，定居于美国东岸的哈特福德城，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

70多岁的容闳定居美国后，隐居于寓所，开始用英文专心写作自传《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America and China），该书于宣统元年（1909）在纽约出版。与此同时，他仍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保持着与康有为、梁启超、谢纘泰、孙中山等人的联系，还经常与谢纘泰讨论关于“争取美国朋友的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中国的问题”。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前，他一直支持康有为等人的活动，并企望把康梁和孙中山等所有中国的改革力量都联合在一起。宣统元年（1909）以后，他逐步认识到康有为“并非一安全可靠之维新人物”因而日益积极地拥护革命派的民主共和主张。他与新结识的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军事家荷马李、美国财界人士查尔斯·布思一起拟订了《中国红龙计划》，准备募集巨款支持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并尽力促成孙中山与布思、荷马李进行会谈。

宣统二年（1910）五月，82岁的容闳因中风卧床。翌年，武昌起义成功，他在病床上拟函祝贺，称这次起义是“了不起的革命”，希望革命者坚持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国的目标，并告诫他们，不要同“野心勃勃的大阴谋家袁世凯”妥协。他让谢纘泰转告孙中山，说自己渴望将来回国参观这个新共和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特致函邀请容闳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函中称容闳是覆清朝帝制而建伟大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幸福的老同志。然而此时的容闳已因脑溢血昏迷不醒。是年4月21日，容闳逝世于美国哈特福德城寓所，享年84岁。临终前，他还谆谆嘱咐两个在美国生长的儿子，回到“新生的中华民国”去，替他报效他深深怀念的祖国。

（高路）

在江苏常熟虞山下，琴水边，长眠着这样一位历史老人，墓前立有他亲自手书的“清故削籍大臣之墓”的墓碑。毁之者说他“揽权误国”，誉之者称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无论评价是如何的歧异，不可否认，他在近代历史风云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就是身膺同、光两朝帝师、两掌部权的著名政治家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晚号松禅老人。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生于北京，其父原籍江苏常熟，宦居京师。常熟翁氏世称旺族，明清以来仕宦显达。翁同龢的祖父曾任海州（今连云港市）学政，是一位笃行好学、清廉正直的官吏。父亲翁心存，为道光进士，曾任礼、户、工部尚书，官至大学士，作过同治帝的授读师傅。母亲也是一位熟悉经史大家女子，她对于子女的管教颇得其法。翁同龢有兄妹四人，均受到良好的教育。翁同龢是兄弟姊妹之中最小的一个，父母兄弟对他格外疼爱。六岁以前，他在母亲和大姊的辅导下，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背诵了数十首唐宋诗词及近人吴梅村的诗。后入塾学，学《四书》、《五经》。八岁时，翁同和随父回到常熟，在这里，他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常熟是著名文物之邦，这里私家藏书闻名海内外。钱谦益的“绉云楼”、毛晋父子的“汲古阁”，顾湘的“小石山房”，冯氏的“空闲阁”，钱曾的“也是园”，席世臣的“扫叶山房”、瞿氏的铁琴铜剑楼等为其中佼佼者。翁家藏书也颇丰富。身处这样的文化环境，翁同龢有志于学，读书勤奋，他整日埋首书中，很少走出书屋，夏日酷热、多蚊虫，他在桌底下放一大水瓮，将双脚置于其中，燃烛夜读。冬日严寒，则手持铜炉，吟诵不辍。在常熟老家，他先后阅读、浏览了百余种文史书籍，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道光三十年（1850年），翁同龢随父亲第二次来到北京，此后他的大半生在北京度过。同年，翁同龢参加礼部举行的贡试和拔贡考试，均名列第一，选为七品小京官。翁的目标不在此，他继续读书，作八股文章，练习楷书。咸丰二年（1852年）翁同和考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又在顺天会试中成绩甚佳，廷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被授为修撰，供职翰林院，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翁同龢是一位学识渊博、平和谨慎的封建官员。29岁时，他被咸丰皇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典试陕西。学官任内，翁同和恪尽职守，认真阅读每一份荐卷。这次乡试之后，他又相继被任命为陕西学政。以及典试山西的乡试正考官。此后，他屡掌文衡，多次充任乡会试的正副考官，门生故旧遍朝野。同治四